

# 从“理想”到“虚构”：论日本战后启示录叙事

何冰洁

**提 要：**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启示录叙事采取现代线性时间观，通过引入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等对立价值的冲突，寻求从战败带来的身份危机中恢复，重建现代国家与国民身份。1970年是日本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随着“宏大叙事”的渐行渐远，日本社会由“理想时代”转入“虚构时代”，启示录叙事从对现实秩序与道德的重现转向在虚构环境中追求理想，价值观变得相对化。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揭示了“虚构时代”的脆弱，个体命运与世界末日危机直接相连、几乎不提及社会组织等中间环节的“世界系”类型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后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

**关键词：**日本 启示录叙事 理想时代 虚构时代

## From "ideal" to "fiction": The Doomsday Writing in Japanese Apocalyptic Narrative after World War II

He Bingjie

**Abstract:** Japanese apocalyptic narrative in the 1960s adopted a modern linear time view, and sought to recover from the defeated identity crisis and help rebuild Japan's modern st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by introducing contradictory value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e year 1970 was a year when Japanese society changed significantly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With the "grand narrative" failing in the real world, Japanese society changed from the "ideal era" to the "fictional era", and apocalyptic narrative shifted from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real order and morality to the pursuit of ideals in the fictional environment. The Tokyo Subway Shalin incident in 1995 revealed the fragility of the "fictional era", and Japanese society ushered in a completely post-modern trend. The "World Series" type emerged at the historic moment and later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of Japanese pop culture.

**Keywords:** Japan; apocalyptic narrative; ideal era; fictional era

根据克莱尔·柯蒂斯（Claire Curtis）教授的定义，启示录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属于科幻文学的一个亚文类。<sup>[1]</sup>启示录文学继承了《新约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的末世论传统，表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独特理解，在思想、审美、伦理、实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记载，公元81年罗马皇帝多米田当政后，大量迫害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他将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使徒约翰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在那里，上帝将真道奥秘启示给了使徒约翰，包括现在之事和将来必成之事。约翰将这些内容记载下来，汇集成成了《启示录》，它对世界未来发出预警，包含了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因此，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各种文学、电影作品被归纳为“启示录”类型。启示录类型作品对当下的社会危机作出回应，体现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忧思，承担着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期待启示与救赎的重要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启示录蓬勃发展，涌现出了大量描写核战、能源危机、气候灾难、地震的末日题材艺术作品。毋庸置疑，当代日本启示录的羽翼日渐丰满，已呈现出相近的风格与特点，有着独特的叙事传统，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于日本启示录的研究目前尚未引发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追踪二战后日本启示录叙事的发展变化，对其进行梳理和评析，对此类作品蕴含的哲学意蕴、大众文化思潮和日本社会危机意识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此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 一、“启示录”话语的历史演变

“启示录”一词出自希腊语中的

“apokálypsis”，意为“揭开面纱”，其原意与揭开、揭示和披露有关，在早期基督教传统中，意为上帝向虔诚的使徒揭示秘密。从公元2世纪开始，“启示录”一词的含义逐渐从对隐秘事物的揭示转变为时间的尽头或世界毁灭的危机。在一些古老传统如印度神话中，将时间理解为周期性的，即无休止地重复一个开始和结束的循环。宗教理论家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指出，原始的宗教通过周期性重复表达了一种信仰，即造物会永远回归到一种神秘的原型。“世界末日叙事中的周期性时间观念是在古代部落民族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观察到自然界中的周期性现象，如行星的运行周期或植物的季节性变化，将这些自然界的逻辑推断到人类世界。他们举行仪式以确保时间能够不断再生，生命可以永远回归到它的神圣原型”。<sup>[2]</sup>它假设一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时间模型，世界不断地重复死亡和再生的规律。这种周期性的世界末日观没有绝对的结束，虽然在每次周期结束时都设想了世界的毁灭，但又假设世界将在下一个轮回中恢复。

与循环的时间观念不同，基督教的时间观念是历史的，是有始有终的。历史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向最后的审判日发展，创世作为人类历史的发端，指明了人类是清晰地朝向未来而生存的。一个新的时间概念建立在这三个因素之上：人类的开端、全盛与灭亡，时间成为直线发展和不可逆转的。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启蒙思想家也告诉人们，人类社会从低级的、原始的形态向现代的、高级的形态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根据罗马尼亚学者卢西

恩·博伊 (Lucian Boia) 的说法,“进步”一词的当代含义是在18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这个词的意思仅仅是“前进”或“增加”。<sup>[3]</sup>到了19世纪,随着进化论深入人心,“进步”开始意味着一种时间上的变化,它将整个世界的历史同步到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表中。“进步”这一宏大叙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启示录叙事与进步主义相结合,发展成线性的历史模型,末日主题变得世俗化,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述对末日场景的想象。而在此之前,关于末日的叙事一直受到教会的保护,教会独占对彗星等天文预兆的解释权。现代启示录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在政治历史和进步叙事中发挥了广泛的作用,为末日危机的构想提供了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启示录叙事带来了重大变化,原子弹的威力表明,人类自身已有能力给世界带来末日。当核战争的影响广为人知,现代进步主义陷入停滞时,启示录叙事开始与后现代话语相结合,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末日已经发生,神性、自然、进步、意识形态等宏大叙事在当代生活中已经无法发挥核心作用。美国当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认为,后现代话语对以往的线性和周期性时间观提出挑战,它揭示了历史既没有起点或结局,也没有可以返回的神圣中心。<sup>[4]</sup>在周期性时间观中,世界属于一种原型模式,所有事件都被归入了永恒的循环中,没有真正的终结。在现代线性时间观中,每个历史事件都拥有独特性,终点永远在未来,历史只能不断地朝着终点前进。然而,后现代时间观念摒弃了

永远有可以返回的神圣中心,或者历史朝着最终目标前进的想法,人们仍然有末日危机感,但它以一种复杂的停滞状态存在,与重大灾难已经发生、又好像已经结束的感觉并存。

## 二、战后日本的启示录叙事

二战前的日本启示录叙事中,引发末日的因素往往是外来的未知力量,比如1897年中川霞城的小说《世界灭亡》、1900年松居松叶的小说《亡国星》均设想彗星撞击为引发世界毁灭的原因。有趣的是,这些作品的大多数结尾都将整个末日事件归于梦境,从而避免了真实世界的毁灭,主人公醒来发现末日只是一场梦,自己又回到了平静的现实生活,世界又再一次回归到它的原型,体现了“没有真正结束”的循环时间观,也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还难以将自身传统身份与现代化相协调<sup>[5]</sup>。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世界末日想象,原子弹爆炸展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破坏性力量,对末日叙事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启示录叙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人类第一次取代了未知的可怕力量,成为导致世界毁灭的因素。“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末日叙事,战后的启示录作品几乎都涉及到由于滥用先进技术而造成的个体、国家、地球甚至宇宙的毁灭。这一时期的日本启示录叙事中,电脑臭虫、大型强子对撞机在实验中生成微型黑洞或奇异夸克团、核战争、过度开采导致地壳活动异常、宇航或地外智能探索引来有害外星生物等,都是导致世界末日来临的因素。这些现象几乎都与科技异

化、失控相关，可以说是人类自身的罪过，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其中，核战的阴影挥之不去。核弹成为日本战后文化中最突出的题材之一，日本的文学、电影和动漫作品都描绘了被核战争摧毁的未来城市，如1954年上映的电影《哥斯拉》讲述了一艘渔船沉没，前去救援的其他船只也相继遇袭沉没的情节，而导致这一连串悲剧的元凶则是遭美国核武器辐射后变异的怪兽哥斯拉。显而易见，“哥斯拉”就是核威胁的化身。电影后段，哥斯拉在东京登陆，毁掉了国会大楼，那些在真实的战争中毫发无伤的政客们，在想象性的怪兽特摄片却劫数难逃，死状甚惨。1961年上映的东宝电影公司制作的特摄科幻电影《世界大战》，讲述了在二战结束16年后，大国之间的政治纠纷依然持续，逐渐分成联邦营（资本主义）和同盟营（共产主义）两大派别，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爆发了世界性核战争，东京被轰炸成一片焦土。

此外，美国占领也对日本战后启示录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加拿大学者沙拉琳·奥尔堡（Sharalyn Orbaugh）所指出的，1945年至1952年的美军占领期是个动荡时期，日本人热衷于讲述个人故事和他们对战争的直接、日常的身体体验及其认识上的错位<sup>[6]</sup>。这一时期的日本人仿佛还未从战败事实中回过神来，一些人甚至觉得战争仍未结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未对战争原因及责任进行反思与清算，就半主动半被动地接受了占领国美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教观、价值观受到了极大冲击，从而使得他们在战后的数年间一直处

于自我伦理身份不确定的状态。战败使日本国家和国民身份发生了明显的不连续性：原来的“日本帝国”想象彻底破灭，原子弹爆炸的灾难、被占领的耻辱以及殖民领土的丧失，令日本人失去了曾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当日本经济和社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末复苏后，“一套连贯而独立的关于战争意味着什么的解释性叙述”<sup>[7]</sup>诞生了。60年代后的启示录叙事倾向于讨论战争的意义及其与日本民族国家身份的关系，将战败的影响整合到末日危机中，以便重建意识形态秩序。启示录叙事围绕着战后日本国家和国民身份的延续性展开，着力处理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战后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反思战争、关注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等主题而闻名，其作品通常涉及现代日本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启示录小说，首先，它们并不真正描述世界毁灭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故事未采用对启示录小说至关重要的未来主义背景。但不可否认，大江的这些作品通常涉及二战后国家身份危机的寓言，如《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描述的兄弟间的对抗、都市与乡村、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都围绕着战后日本身份的重建问题展开。在这部作品中，现代个体所感知的心理时间得以凸显，呈现了主人公精神不断发展、成长的线性过程。无论是蜜三郎还是鹰四，都无法回避自己对历史、当下、未来的态度。小说人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正视过去，朝向未来。小说通过在现实生活中饱受精神创伤的主人公对身份认同的追寻，来表现对个体存在的叩

问，通过历史回溯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试图从中发现现代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鹰四崇拜领导万延年农民暴动的曾祖父的弟弟，效仿其行为召集村里的年轻人组建球队，并发动所谓的“想象力暴动”，哄抢了在日朝鲜人经营的超市。这种集体性的破坏与日本战后国家和民族的危机相似，因此有学者将这部小说归类为“软”启示录小说<sup>[8]</sup>。如上所述，60年代的日本启示录叙事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施害者与受害者等对立性价值观的冲突，着力描述日本国家和国民身份在过去与现在的不连续性，启示录文学作为一种重建国家和个人身份的工具，试图帮助日本从战败带来的身份危机中恢复，寻求摆脱战败创伤记忆的方法。

### 三、从“理想时代”到“虚构时代”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9年冷战结束，西方国家经历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逐步过渡。而批评家东浩纪认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爆炸式转变<sup>[9]</sup>。日本战后早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由战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遗留物支撑的，这些遗留物在本质上仍然是现代的，而这种巩固在70年代松动了，后现代趋势由此迅速地在各种文化类型中蔓延开来。社会学家大泽真幸也发现了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这段时间和1970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文化上的不连续性，他把1945年至1970年这段时间称为“理想时代”，1970年至1995年称为“虚构时代”<sup>[10]</sup>。

大泽真幸把转折点定在1970年左右，指出这一年是日本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可以说，“理想主义”时代反映了晚期的现代精神，而“虚构时代”象征了后现代的开始<sup>[11]</sup>。

“理想时代”是指意识形态等宏大叙事在现实中仍然有效并发挥作用的时期，日本60年代以“安保斗争”为代表的社会运动热潮，表明人们依然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理想。而“虚构时代”则是指宏大叙事在现实世界中失去效用，人们转而在虚构中追求理想的时期。当“理想时代”试图为世界赋予意义失败后，“虚构时代”不再努力为世界强赋意义，转而去接受和探索这个混沌、无序、破碎的世界本身。随着“虚构时代”的普及，启示录叙事的重点逐渐从对现实秩序和道德的重现转移到对虚构环境中理想的追求。“虚构时代”的启示录叙事逐渐脱离了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价值观变得相对化。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启示录作品中，随处可见碎片化叙事，叙事片段在时间及空间上是相异的、破碎的，它们之间没有承上启下的剧情联系，而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网状关系。此外，对世界末日的虚构想象也变得普遍，无论新兴宗教还是文化流派，大量电影、动漫、文学等艺术作品都涉及了世界末日主题，如动画片《宇宙战舰大和号》、《风之谷的娜乌西卡》和《AKIRA》都以发生过世界性核战争为背景，描述了末日战争的过程。

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广泛地影响了日本的社会文化，象征着“虚构时代”的瓦解和崩溃。<sup>[12]</sup>1995年3月20日的早高峰时段，十个奥姆真理教

信徒分成五组钻进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东京纵横交错的地铁上撒下了沙林毒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其中死亡十二人，多人终身致残。而在仅仅两个月前，日本神户发生了7.2级的阪神大地震，地震造成约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超过六千四百人。村上春树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的后记中就此事写道：“1995年1月和3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这一对灾难有可能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作为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sup>[13]</sup>。这一灾难性事件彻底地动摇了战后日本稳定和安全的社会形象，也改变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它揭示了“虚构时代”的脆弱性，使人们明白了在虚构中寻求理想的行为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毫无意义。这一事件还改变了日本人对于“他者”的理解，它残酷地提醒人们，生命可能会突然结束，末日有可能突如其来。在后现代社会中，死亡类似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他者”，可能突然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人们已经很少面对突然的、致命的危险，如战争、瘟疫和饥荒，大量人口突然死亡的可能性已经被遗忘，但此时它不可思议地“复活”了。启示录叙事也试图描述未知的“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危机时刻。在之前的日本启示录叙事中，“他者”往往被想象为敌人、可怕的外国势力、未知的神秘力量甚至现代化，

而如今，日本人在他们内部也发现了“他者”。

作家们开始用笔墨刻画个人在遭遇危机后被迫改变的日常生活，村上春树的《地下》率先对沙林事件发出控诉之声，川上弘美的长篇小说《水声》则续写了《地下》之后人们陷入混沌的精神世界，讲述了弟弟因为遭遇地铁沙林事件而陷入精神危机，深受失忆以及严重失眠症的困扰，因此“我”陪同弟弟重新回到父母空置多年的老房子，以对抗社会危机和集体暴力、修复精神创伤，以期再次回归日常生活的故事。促使“我”和弟弟返乡居住的，正是那一场不可抗的社会暴力——地铁沙林事件。

“以沙林事件为界，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大不一样了。这种滋生于社会内部的突发暴力侵袭，导致了日本人常规认知和理解体系的崩溃，而新经验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在有效经验欠缺的阶段，由于缺少可以遵循的范式，以循规蹈矩著称的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陷入了混沌状态。”<sup>[14]</sup>《水声》刻画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陷入了混沌状态”后的挣扎与求救，弟弟陵遭遇地铁沙林事件后曾出现暂时性失忆，直到和姐姐共同生活很久之后才能重新回忆起当时那触目惊心的场景。“那女人就像人偶一般在我眼前倒了下去。手脚直挺挺地，无依无靠。啊，这不就完了吗？太可怕了！虽然出席过好几次葬礼，也见过人的尸体，如此真切地看见死亡本身，那时是第一次。那个女性的死亡远远比妈妈去世的时候更加鲜活地留在我心中。事后我才知道沙林这个东西，我清晰地理解到：一种蛮横无理的东西突然冒出来将那个女性的时间硬硬一截两段了……阪神

大地震后的地铁沙林事件把我拉到了死亡的边缘。宛如平地里埋了一颗地雷，死亡在那里要多少就有多少。我明白，只要轻轻一踩，死亡就会立刻攫住我的生命。”<sup>[15]</sup>从《水声》对死亡他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川上弘美对当下社会危机的思考，在看似和平的时代，社会共同体内部其实也充满着动荡和不安，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日常生活中看似自然而然的事情，却不知何时会突然因为意外事故被活生生地截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支持意识形态和界定社会规范的公共空间的概念称为“想象共同体”，即个人可以与他人会面的虚拟公共空间，它超越了现有的共同体的限制，安德森解释说，文化想象创造了这种公共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运动等宏大叙事被各种类型的“想象共同体”所共享<sup>[16]</sup>。然而，一旦宏大叙事的前提不再被信任，在这些“想象共同体”中，依靠共识进行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灾难性事件摧毁了现代日本的安全神话，引发了“虚构时代”的瓦解。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现代化社会拥有先进的城市规划、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社会系统，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受任何威胁。但现实揭示了这种想法的脆弱，使他们认识到即使在和平的高度现代化社会中，一些不可思议的未知事物也能带来破坏和毁灭。1995年的末日性灾难揭示了日本社会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已不再安全可靠。在此背景下，以青少年为主要目标群体、将世界末日危机与校园爱情相结合的“世界系”类型应运而生。1995年，由庵野秀明执导的动画作品《新世

纪福音战士》将世界末日危机与14岁少年主人公真嗣的内心世界直接联系起来，作品以发生了“第二次冲击”大灾害的2015年的世界为舞台，主要讲述了14岁少年少女们操控巨大人形决战兵器“EVA”，与袭击东京的神秘敌人“使徒”之间的战斗故事。故事中个人依附的组织、从属的社会团体被极限淡化，少年主人公承受的心理困境跨越了中间环节，直接与全人类的命运挂钩。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线与世界灭亡的重大危机直接相连，几乎不提及国家、社会等作为中间地带的“想象共同体”。“世界系”启示录不再费心为现实的失败或创伤寻求解决方案，也不再努力追求成熟，而是完全退出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大受欢迎后，“世界系”作品快速增加，进入21世纪后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

#### 四、结 语

本文通过追踪日本启示录叙事从“二战”结束以来到21世纪初的变化轨迹，试图阐明日本战后启示录文学如何反映和应对战后日本的重大社会政治变化，处理不断变化的威胁性症状与危机，以减少社会性焦虑，创造更清晰的未来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世界末日想象，原子弹爆炸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破坏性力量，对末日叙事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启示录叙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人类第一次取代了未知的可怕力量，成为导致世界毁灭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的启示录小说采取线性时间观，通过引入过去与现在、农村与城市、日本与美国等对立价值观的冲突，维

持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历史模式的和谐。1970年是日本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随着“宏大叙事”在现实世界中失效，日本社会由“理想时代”转入“虚构时代”，启示录文学的叙事重点逐渐从对现实秩序和道德的重现转向对虚构环境中理想的追求。1995年日本经历了两次重大灾难，揭示了“虚构时代”的脆弱性，个体命运与世界末日危机直接相连、几乎不提及社会组织等中间环节的“世界系”作品应运而生。

战后日本的启示录情结在大众流行文化中的涌动，并不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的简单复归，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灾害、战争等一系列天灾人祸让人类明白了生命是何其脆弱，世界末

日随时可能来临，可以说，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关注已经成为了当下时代的思想主题。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滥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加速了末日的来临，全球变暖、生态危机、小行星撞击、核战争、艾滋病等问题让人类生活在末日的恐慌之中，基因技术、核技术如果被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则会导致人类种族的灭绝。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类不得不认真思考人类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启示录文学从世界末日的角度出发，对世界的存在进行考察和反思，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把握人类存在的本质，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启发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研究启示录文学的意义所在。

#### 注释：

- 
- [1] Curtis, Claire P. *Postapocalyptic fiction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We'll not go home agai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p3.
- [2] Eliade, Mircea.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Or, Cosmos and History.* trans. Willard R.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1.p22.
- [3] Boia, Lucian. *Sekai no sh ū matsu.* trans. Moriya Nobuaki . Tokyo:Papyrus,1992.p98.
- [4]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3.p62.
- [5] 十津守宏：「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の終末論—終末論的伝統の「東」と「西」との比較文化論的考察，『鈴鹿国際大学学報』2003年第23期，第7-17頁。
- [6] Orbaugh, Sharalyn. *Japanese Fiction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 Vision, Embodiment, Identity.* Leiden: Brill, 2007.p16.
- [7] 同上注，第18頁。
- [8] Tanaka, Motoko. *apocalypse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St.Martin P, 2014.p83.
- [9] 東浩紀：『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東京：講談社，2001年，第7-8頁。
- [10] 大澤真幸：『虚構の時代の果て』，東京：筑摩書房，1996年，第38頁。
- [11] 同上注，第62頁。



- [12] 同上注，第89页。
- [13] 村上春树：《地下》，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64页。
- [14] 吕斌：《<地下>的叙事结构与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1期，第78页。
- [15] 川上弘美：『水声』，東京：文藝春秋，2017年，第232-237頁。
- [16]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 Ed.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0.pp 282-288.

（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研究生）